

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背后的异同分析 ——对迈克尔·舒登森“新闻客观性”解释的再解释

张健¹ 沈荟²

(1.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2. 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迈克尔·舒登森关于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的分析突破了新闻史研究的传统框架和方法, 但也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弱化了两者的共同性的说明。本文在说明两种模式差异的同时着重阐释了两种模式在作为公共机构、对事实和精确性的追求以及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煽情主义风格等方面存在的共同点, 特别说明了两种模式背后的“天真经验主义”知识观。

【关键词】 信息模式; 故事模式; 客观性; 知识观

【中图分类号】 G219

【文献标识码】 A

“在自由民主社会中, 客观性是新闻记者的专业意识形态的一块基石”^[1], 但“客观性为何出现与何时出现”却始终是一个背景性问题, 因为不回答此问题, 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就无法将其与历史和社会联系在一起^[2]。话虽如此, 起源问题又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无论在驱使客观性发展的要素层面, 还是在找寻其诞生的具体日期层面。2013年最新出版的《新闻客观性》一书列举出解释新闻客观性的各种不同说法, 如“专业主义观”、“技术观”、“商业主义观”、“政治观”以及“其他因素观”等五个方面的观点; 至于客观性的起源日期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比如“1830-1880年间新闻作为商品的原型时期”、“民主现实认识论的客观性”、“以记者为中心的的职业或组织时期的客观性”、“1900年前后的信息客观性”、“作为理想的‘一战’之后的客观性”、“1960到目前阶段: 偏见与可信度之间作为争论原则的客观性”^[3]。

迈克尔·舒登森(Michael Schudson)在《探索新闻(Discovering the News)》中以“客观性”为统领, 通过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的考察, 将报业融入社会体系去研究, 提出只有“到了二十世纪, 怀疑论成为主流, 人们发现即使是讯息也有它的选择性, 甚至回忆与做梦都有选择性, 所谓的理性, 骨子里, 也是受到个人利益、意志与偏见的影响。这一切影响了1920、1930年代的新闻, 并促使客观这个新闻理念的兴起。”^[4]舒登森还提出, 从1890年代前后, 即从美国现代新闻业的发端开始, 新闻报道就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故事模式, 以《纽约世界报》为代表, 一类是信息模式, 以《纽约时报》为代表。舒登森认为, 现代新闻报道从一开始就有两种特性, 即真实性和娱乐性, 或者说反映了传媒的两种功能: 提供信息、讲述故事。

舒登森对客观性源起的解释连同其“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影响较大, “对各种社会、

【作者简介】 张健(1967—), 江苏东台人,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 博士

沈荟(1971—), 安徽合肥人,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1YJA860033);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0BXW001); 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

历史和文化资料的得体运用有助其学术研究，实际上是非历史性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发挥其优势的一个模式”^[5]；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舒登森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对美国现代报业发端时两种报道模式的解剖，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6]但据笔者阅读所及，“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提出除了从社会、文化层面丰富了“客观性”之外，某种意义上给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增加了新的困惑。本文在简述这种困惑的基础上试图把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下去，既概括其异同点，更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观和知识观。

进步主义新闻业的解释悖论与信息模式、故事模式

对进步主义时期的新闻业如“新式新闻事业”、“黄色新闻”、“煽情主义”等作出恰当的评价和阐释是美国新闻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的差异，在不少理论问题上却存在着种种不尽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和结论，比如如何评价奥克斯与普利策？由于奥克斯及其《纽约时报》、普利策及其《世界报》在美国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人们对二人尤其是普利策的新闻实践出现了矛盾性的评价。比如因《纽约时报》代表着理想的专业报纸模式，罗斯可就把《纽约时报》视为“现今所谓‘客观报道’的一个典范”，而昂德伍德则恰恰相反，坚持认为“正是奥克斯的模式有助于20世纪的报业把更加厚脸皮的商品本质掩藏在正出现的客观性和专业主义修辞之下，掩藏在一个日益扩展的信念之下，即媒介应该作为一个照看公共福利的负责任机构。”^[7]普利策的传记作家斯旺伯格认为：“普利策既是一位改革家，又是一个推销员。这充分体现他具有两种敌对的个性。这两种敌对的个性在他身上互相抗衡，谁都占不了上风，使得他后半生不得安宁”^[8]。如何说明普利策之“改革家”与“推销员”之间的矛盾？这种在奥克斯与普利策身上的矛盾性评价如何又加以弥合？

又比如煽情主义与客观性新闻的矛盾评价。现代批评家往往将煽情主义新闻(sensationalism)等同于自我炫耀和对犯罪、性、暴力以及细节等内容与形式的过度强调^[9]。煽情主义一词通常被理解为用于描述跟“客观性”相反、回避社会责任而有利于经济回报的一种报道风格。这一理解包括了描述词“客观的(objective)”和“耸人听闻的(sensational)”关系状况以及它们得以出现的文化语境。这一结论以及与之相伴的、把煽情主义误读为客观性的对立面为其中的一种解释留下了空间，即煽情主义仅仅存在于制造商的贪婪、消费者的庸俗追求等因素之上。这一解释结构从历史上或概念上都难以自圆其说，缺乏阐释力^[10]。比如由于普利策既强调事实和准确性，又以运动和煽情手段吸引读者见长，于是“普利策的性格与工作的矛盾总是一件烦恼的事情。《世界报》的主要辩论是要将新闻里面的煽情主义与社论页的非常正大的特性融于一炉。”“他的面部的一边表现着有学者的风度，而另一边则有恶魔的气派。”^[11]

再比如，如何认识和评价揭发黑幕运动所呈现的社会矛盾与煽情主义报道之间的关系？从写作风格而言，黑幕揭发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记者出身，其报道客观严肃，被称为“学者型”黑幕揭发者。代表人物有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等。斯蒂芬斯平均每年写4篇报道，对政府腐败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露。塔贝尔花了5年时间调查，只写了15篇报道，最后汇编成书《美孚石油公司史》。另一派是以大卫·格莱汉姆·菲利普斯和厄普顿·辛克莱为代表的“作家型”黑幕揭发者。前者通过《参议院的背叛》系列报道来揭露美国参议员的腐败行径，因其煽情主义色彩太浓而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奚落为“肮脏的、嘴臭的流氓”。后者虽然只花了7周时间进行实地调查，但凭借其妙笔生花的才华，写出了揭露芝加哥屠宰场脏乱状况的《屠场》，影响巨大，直接推动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出台。那么，如何说明这两类记者即所谓的“作家型”记者与“学者型”记者？黑幕揭发者如何将煽情和客观融为一体从而鼓吹和呼吁改革？

舒登森的“客观性”研究，无疑属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研究“专题化潮流”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方法和新史料，带来了深化研究的可能性，必然使研究突破整

体性叙事，而进入专题层面的探讨”^[12]，但这种“客观性”研究在“突破传统研究框架”的同时，由于部分问题的语焉不详似乎给进步主义时期的新闻史学增加了一些新的困惑，即“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区别与共性问题。1890年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驱使美国新闻业“产生了不同于刚刚消逝的过去，却与20世纪相像的新概念和新做法”^[13]。当时的纽约报业市场上，有《太阳报》、《先驱报》、《论坛报》、《晚邮报》、《纽约时报》等数家报纸。《世界报》和《新闻报》选择趣味，《纽约时报》选择“以事实报道为原则”，如同舒登森所分析的，两类报纸在社会历史背景、美学特性、读者阶层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这是作为商业企业的报纸所采取的各自不同的竞争策略。但是对于《探索新闻》一书的读者来说，既然“新闻自1880年后”以“说故事”成为一项职业^[14]，这个“1880年后”起码应该包括1890年到“一战”前后20多年时间，为什么到了1890年代又衍生出两种模式——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这是不是意味着信息模式不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说故事”的记者是不是不需要重视“事实”？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1880年后的新闻“说故事”与“一战”后对新闻客观性的广泛讨论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这些重要问题在《探索新闻》中似乎都语焉不详，有进一步讨论和生发的空间。

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差异

如前所述，舒登森认为，从1890年代前后，美国现代新闻业的报道风格主要可以分为两类：故事模式、信息模式。1896年8月，阿道夫·S. 奥克斯（Adolf S. Ochs）接管《纽约时报》后立即开始出一份指南，列举外地来本市采购货物的人员名单、报道每天的地产交易情况、增加每周的金融回顾、全文刊载法庭纪录、政府新闻、总统咨文等，形成舒登森所谓的信息模式。奥克斯通过减少新闻栏的党派性并以一种正派、公平无私的方式报道新闻，向全国展示了报纸可以提高它们自身的声誉，提升它们的经济利益。奥克斯还任用了20世纪上半叶最具传奇色彩的报人卡尔·V. 范安达（Carr V. VanAnda），后来由其策划、指挥并组织实施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报道至今仍然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策划性报道之一。《时报》还把“刊登所有适宜刊登的新闻”这句话作为报纸座右铭刊登在报眼位置，强调报道的真实、准确；反对黄色新闻之风，拒绝刊登连环画和“噱头”消息，并且以“本报绝不会弄脏早餐桌布”的口号做广告，甚至在社论中建议读者：“应合力使阅读黄色小报成为一种为人嘲笑的行为，只能暗地中生存，这将是道德改革有效之道。”^[15]

而普利策早在1883年接手《世界报》后就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提出了十条措施，并推荐给政治家们。它们分别是：“对奢侈品征税；对遗产征税；对高收入者征税；对垄断公司征税；对享有特权的公司征税；征收收入税；改革行政机构；严惩贪官污吏；严惩倒卖选票者；严惩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16]这十条改革措施很得人心，今天，除了第六条外，大多数都成了美国的法律。正如舒登森所注意到的，普利策的《世界报》在揭露种种社会问题时，实际上把他的读者设定为“新的政治参与者、新的阅读人口、城市新居民、新到美国者，和初尝社会阶层流动经验的人”，这些人“和别人一样需要道德忠告的故事，但是圣经故事与圣人事迹已不再适合城市步调，新式新闻事业才是。”^[17]于是采用煽情主义的手段也即舒登森所谓的“故事模式”来报道新闻事实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如1883年5月11日，是普利策购买《世界报》后的第一期。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如下报道：两起判决执行，一起在新新监狱，杀人犯拒绝神父为他作临终祷告，并吼叫道：“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是民主党人！”；另一起则在匹兹堡，死刑犯对行刑者咆哮道：“再见了，你们这些杀人犯！你们绞死的是一个无辜的人！”。一则关于新泽西州发生风暴造成损失的报道标题为《致命的闪电》，副标题为《损失6条人命和100万美元》。同一期报纸还报道了加利福尼亚百万富翁詹姆斯·基恩破产的消息：此人正在抛售一幅以牛为主题的画，要价8000美元——结果损失4000美元。买主正是杰伊·古尔德。最后还有神秘事物报道：谁

挑起了最近发生在海地的流血叛乱，是否使用了炸药而导致了400人丧身？

从简单的介绍之中不难看出，所谓故事模式与所谓信息模式之间的主要差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参见表1）：

表1：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之区别示意图

	故事模式	信息模式
报道内容	地方新闻、法庭新闻、插画、评论、女性专版、休闲生活等	政治新闻、财经新闻等
主要功能	娱乐或“用报”	呈现真实与信息
读者阶层	新政治参与者、新城市居民、新移民	中上阶层如知识分子、工商人士等
文化趣味	大众文化	精英文化
报纸风格	自我宣扬或煽情主义	冷静、正派、高贵、保守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根据《探索新闻》一书第3章的内容进行整理

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相似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之间存在如此差异，但是迈克尔·舒登森似乎有意无意地将分析重点放在了差异的一面，但是弱化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信息模式不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换句话说，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这两种“模式”之间有没有共同特点？或者说，《纽约时报》和《世界报》就新闻报道来说是不是至少存在某种相似之处？

其实答案首先隐含在舒登森自己的分析之中。他在第3章开头就指出：“报道新闻是十九世纪末的产物，它的特点是专业记者的兴起与记者和报社制度的相抗衡。虽然记者在相同的理念下团结一致，但报纸间却各自寻求不同的风格。”^[18]这就是说，1890年代，新闻记者对报纸、新闻以及专业等已经有了大致相同的共识。这种共识明显表现在《纽约时报》与《世界报》对报纸在民主社会中的功能认知中，对报纸作为公共机构或公共论坛的强调。比如普利策声称：“《世界报》对我来说远远不是一份私产，我把它看作一个公共机构，有能力每天对公众的思想施如影响，并观察和维护公共的道德和公共的利益。我强烈地希望……将能完全担自起对这一公共机构的责任。”^[19]奥克斯则提出：“我将无惧政党与金钱压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经营，使《时报》成为人们关心话题的公共论坛。……《时报》……以大众的关注话题为重心，这个方向也不会改变。我们将致力于呼吁财政与关税的改革、反对浪费与挪用公款、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干预、确保人民的权利，以促进一个良心社会的到来。”^[20]这说明，尽管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终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是相当接近的：报纸是一个公共机构、公共领域。正如沃德所指出的，“精英自由主义假定：自由报纸是严肃的教育者，不能滑向煽情主义和利润；大众报纸需要严肃的新闻而不是软新闻和丑闻去承担充分的公共利益，但是两种理想都预先假定：大众社会中通过传媒得以实现一个理性、民主的公共领域。”^[21]

其次，两份报纸同样强调事实和事实的精确性。虽然《纽约时报》几乎以其冷静的信息模式，“通过正式、平衡，不会触犯具有各种党派倾向的读者报道新闻，来提升自己的名誉、增加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正是《纽约时报》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展示了专业报纸的宿影”^[22]，但这并不是说，“普利策对事实很冷漠，或者他仅仅对具有情绪冲击力的报道感兴趣。”^[23]年轻记者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为了找份记者工作时走进《世界报》编辑，见到该报墙上赫然挂着这样的木板，上书：“精确，精确，精确！谁（who）？什么事情（what）？什么时间（when）？哪里（where）？怎么样（how）？事实——色彩——事实！”新闻报道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结果和怎么样”后来被简称为“五个W”，成为中外新闻学入门级的“ABC”。不妨再对照《芝加哥论坛报》的文学编辑埃德温·休曼（Edwin Schuman）1894年出版的美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新闻学教科书《步入新闻业（Step into Journalism）》。休曼提出：“没人关注在政治事务或关键事情上记者个人的想法是什么，记者的任务就是复制事实和其他人的意见，不是表达

他自己的意见。”^[24]休曼的书涵盖了新闻客观性的基本要素：倒金字塔结构、非党派性、超然、依赖于可观察的事实、平衡^[25]。这说明，普利策及其《世界报》某种意义上与《纽约时报》等其它报纸也按照当时新闻界通行的共识在进行新闻工作。

而且，普利策要求他的记者在写作富有色彩的新闻消息时并不会以牺牲信息的精确性为代价，比如：当完成采访时，记者都要给出一个吸引人的、生动的主题概括。在一次对新任新闻主编谈话时，普利策提出：“我们经常刊登什么样的文章？它们应该是创新的，有特色的，戏剧性的，浪漫的，引人入胜的，无与伦比的，希奇古怪的，高雅的，幽默的，俏皮的，既无损高雅又不降低格调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决不能让读者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或对报纸的信赖产生动摇。”^[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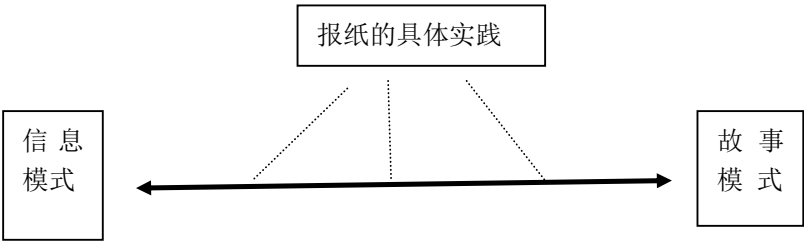
某种意义上，《世界报》先后猛烈抨击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贝尔电话电报公司以及因公交公司而受贿的市政议员等，正是煽情性和事实性的结合，实际上开启了世纪之交报刊黑幕揭发运动的序幕。由此，普利策带给新闻业两个重要的传统：一是准确。曾任《世界报》执行总编辑的张伯斯回忆说：“事实、事实，除了事实，什么都不要。禁止使用的字眼名单其长无比，万一误用了这些字眼，又逃过了核稿记者的法眼，见报后，记者不是被罚薪一个星期，就是卷铺盖走路。而这套规矩严格实施”^[27]，对事实和准确性的强调使得普利策所掀起的讨伐运动充满战斗力；二是帮助新闻界建立了“主动发掘新闻的传统”。普利策以实际而又准确的记者调查推动公共事务的发展，“不但报道新闻，更进一步制造新闻，意味着他的报道实际介入了公共事务的进程”^[28]。公共论坛的功能和娱乐故事的报道手法的结合，是普利策报纸的主要特色之一，用现代流行语来说，普利策把“阳春白雪”的社论嵌入到一张“下里巴人”的报纸中^[29]。

三、《纽约时报》对新闻事实的追求中表现出一定的煽情主义。虽然，《纽约时报》和《世界报》选取了各自不同的报纸风格：信息的、冷静的因而“听起来头头是道”；美学的、故事的、因而也是煽情的或耸人听闻。《纽约时报》多次以高尚报纸自居，并联合《太阳报》及其它报纸，掀起一场场新闻道德战争，以“不弄脏早餐餐巾”为口号，对《世界报》和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发起指责和讨伐。《时报》、《晚邮报》、《太阳报》等均有新闻和评论对《新闻报》和《世界报》的黄色新闻进行抨击，比如1897年2月2日《时报》在社论版刊登《假新闻与宴会》，抨击《世界报》大肆报道的“豪华宴会”，指出插画家在宴会没有举行之前便画好插画为“假新闻”^[30]。

但是，在纽约这个共同的新闻市场上，尤其《纽约时报》不得不多次面临着《世界报》、《新闻报》故事风格的剧烈竞争。比如《世界报》降价至2美分之后，《纽约时报》不得不将报价降为2美分；《世界报》所创新的广告刊播体制迫使报纸经营越来越像生意^[31]。这些激烈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如本杰明所说的那样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不能并存”^[32]，相反，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学风格和信息风格可以在各自保持主体特征的情况下相互可以越界。比如德瑞尔（Trevor D. Dryer）对《纽约时报》和《世界报》1898-1902年之间的法庭报道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跟大多数人们假设的相反，仅仅就刑事审判的报道而言，《纽约时报》与《纽约世界报》呈现出更多相似的所谓煽情主义或黄色新闻特征：相同的叙事风格、对捉摸不定的人性的同情、热心于法庭辩论的证据和科学。总体来看，哪一份报纸都没有比另一张报纸更可靠；两份报纸都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完成刑事审判报道^[33]。

素以严肃著称的《纽约时报》在法庭新闻报道上表现出来的煽情主义特征说

图 1 新闻实践模式示意图（其中虚线代表各种不同的报纸风格）



明：舒登森对这两种模式的概括仅仅是“事后诸葛亮”式地提炼出来的“理想类型”，在新闻报道的具体实践中恐怕难以有具体而严格的划定，每家报纸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位和资源选取处于信息与故事之间的灰色地带（参见图1）。更何况，正如普利策的实践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阶段的新闻业对事实与故事同样重视，“强调事实与讲故事的功能之间没有任何冲突”^[34]。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在故事与信息之间的连续系谱上，《纽约时报》更接近于信息模式一端，而《世界报》更接近于故事模式一端。

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背后的知识观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共同点之外，《纽约时报》与《世界报》还有相同之处，也就是说支撑世纪之交新闻业的知识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客观性观念是建立在……一种知识理论之上的，这种知识理论认为，某些观念或陈述与‘自在’的现实之间产生一致性时，客观知识就诞生了。”^[35]

从整个19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系统环境来看，对自然世界、社会包括人生的认知和把握似乎是透彻而自明的，只要在自由的“民主市场社会”奋发进取，一切人都将会通向自由的彼岸，如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萨姆纳所宣称的那样，“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36]整个19世纪的美国，尽管经历过种种骚乱、南北战争、经济危机，以及美西战争等，但是，“在19世纪的美国人看来，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在按照常规运行。甚至分裂和重新统一的过程也是按照一个熟悉的模式进行的。”^[37]然而，到了世纪末，普遍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原先的自由主义理想遭到挑战，人们普遍面临着认同与表达危机，因为社会大大扩展，社会对个人丧失了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媒介是把社会重新变得透明的重要工具。研究显示，科学报道反映了典型的“美国梦”以及现代传播发展的一般模式——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传播系统，因为建立在坚固事实上的科学的新闻业能够提供一致的信息，这样就解决社会矛盾。科学与技术是当时社会认同的解决矛盾的两个法宝^[38]。用舒登森的话来说，就是“天真的经验主义（naïve empiricism）”，“十九世纪末，科学已经在制度化建设中树立了权威地位，而1890年代的记者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等同于科学家，揭示工业化生活领域的经济和政治事实，力图比以往任何人所做的都更透彻、更清晰，并且更写实。这是美国当时的进步主义者追求政治改革的一部分。”^[39]

被称为“第一个揭丑记者”的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就很有代表性。在《自述》^[40]中，他说自己做报纸记者时曾经窥探过政党政治和政治贿赂的内幕，见过政客、警察、立法机关和法院的腐败，但他始终无法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怎么回事？……我无数次这样问道，却始终没有找到或总结一个答案出来。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寻觅着答案，它理应存在于我们神经系统的某一处，只是没有以文字形式存在于我们的脑中而已。”^[41]后来，当斯蒂芬斯准备去费城调查政治腐败之前，在与S. S. 麦克卢尔争论中他阐述了腐败的症结所在。麦克卢尔将政界的贪污腐败看成是个别的、地方性的犯罪现象，是可以被确认和处理的，不必憎恶和惩罚任何人。斯蒂芬斯却认为，这种政治腐败和犯罪来自于一种体制，“体制一成不变，……（即使）由一位经验丰富、聪慧而正直的专家亲自起草，旨在与旧的腐败政治的罪恶典型相抗衡并击败后者。但在这个宪章背后起操纵作用的依然是原来的老板、集团和机构。”所以，“政府的形式无关紧要，宪法和宪章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的实际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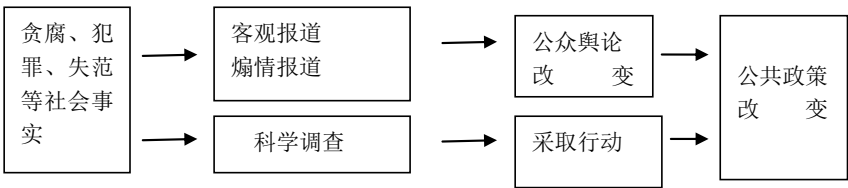
斯蒂芬斯在《自述》中总结他之所以有如此结论，是因为他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对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匹兹堡、纽约等城市进行了调查。而他所谓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先提出一种假说，然后用事实来验证，而一种验证事实真相的方法就是将预测建立在你的理论上，然后观察事件的结果。而对于新闻来说，……我的理论意味着探究政治学和政府行政学的基础所在。”换言之，对斯蒂芬斯而言，揭丑新闻的本质并不在于发现新的事实甚或揭露丑行，而

在于“感动和说服”公众认识其周遭的真正形势；前者仅仅意味着“了解”，而后者却意味着“行动”。所以，在选材过程中，斯蒂芬斯并没有刻意去描述种种腐败的细节、描写可能具有耸人听闻色彩的“隐私”，而是把公众习以为常的事实综合起来，以一种高的姿态对其进行提炼分析，从而促使普通人“觉醒”和“行动”，这才是“真正的新闻”，才显示出新闻制造舆论的力量。

如果结合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社会政治现实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斯蒂芬斯们背后的假设：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大胆地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改革代理人”，为解决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危机，一个追求民主、理性和科学、富有教养的“民主公众”是关键。而达成这种“民主公众”的途径有二：一是公民的素质；二是公民“公共性”讨论的机会。这是“民主公众”能否形成的两个基本条件。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如何对公民进行素质教育，又如何扩张和提供这种“公共性”的讨论机会^[42]。这样，在进步主义历史舞台上就出现了两类人群来有效地行使这样的历史使命：一类是以约翰·杜威、莱斯特·弗兰克·沃德为首的教育家、牧师与社会工作者，他们重视公民素质培养和教育，希望通过学校教育等途径，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理性和能力，如杜威提出：“民主社会的真义在于，它的特殊的价值以及它的特殊的目的与目标必须广为传播，从而成为其社会成员的思想与意志的组成部分”。一类是以约瑟夫·普利策、阿道夫·S. 奥克斯、林肯·斯蒂芬斯等人为代表的新闻编辑或报刊业主，他们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清晰而朴素的议事日程：发现事实，把事实传播给人民，然后让人民去改变世界。

换言之，进步主义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就成为改革主义者发现和传播事实的大众通道，“个人主义者依赖人的理性和道德良知力量去影响他们的目标。尽管他们认为，人内在固有的理性和良知的推进将促使人们转向预期的目标，但他们还是怀疑人们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唤醒他们采取行动。这样，教育、规劝就成为个人主义者主要的社会行动技巧。他们最典型的方法是把工业生活中的那些事实进行曝光、揭露与扩散，而且这些事实在他们本身也已经产生了负罪感；他们希望其他人也会对同样的事实做出同样的反应。”^[43]戴维·布劳泰斯（David L. Protess）等人指出，调查性报道的传统观念认为，普通大众一旦被激励就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催化剂，媒介的揭露性报道通过改变公众舆论引发公共政策的变革，他们称这个模式为“激励模式”^[44]，用图2来表示就是：

图 2 进步主义报道的激励模式图



其实这个“激励模式”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理性假设（信赖

理性与道德良知）→采取行动（发现和调查）→写作或报道事实→公众舆论→政策反应。我国学者王希也如是概括黑幕揭发与进步主义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进步主义者推动改革的基本过程是：揭露社会黑暗和流弊，制造舆论；借用民间和专业团体的组织功能，动员群众，组成利益集团，形成改革声势；提出具体的改革要求，并广泛传播，使之成为醒目的公共议题，迫使寻求当选的政治人物将这些议题带入到各级政治程序中去”^[45]。

结语

分析表明，舒登森对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界定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却相对弱化了这两种模式之间共同性的说明。实际上，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仅仅是一种理想类型式的概括，两者既在报道内容、报道风格、读者阶层等方面存在着区别，更在对报纸的社会责任、追求事实和事实

的精确性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共识，尤其在新闻业的知识观方面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知识“激励模式”。

在此意义上，普利策的《世界报》之所以与号称“专业报纸典范”的《纽约时报》拥有较多的共同点，原因在于，“普利策将煽情主义、带有讨伐性自由主义改革的故事叙述和技巧，与对公寓建设、掺假食品、官员失范、公司不法行为的调查结合起来”^[46]，既有煽情的事实与细节，又有自由主义的改革诉求，是客观性与煽情主义或所谓的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两种叙事模式的融合造就了《世界报》的成功。

注释：

- [1] 朱迪丝·李钦伯格：《为客观性辩护》，载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 [2] Steven Maras.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Malden: Polity Press, 2013, p. 22.
- [3] Steven Maras.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Malden: Polity Press, 2013, pp. 22-58.
- [4]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12页。
- [5] Albert E. Gollin. *Critiques and Celebrations of the Newsmaking Process: An Expository Review*.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44, No. 2 (Summer, 1980), pp. 276-283.
- [6] 陈昌凤：《从哈德森到夏德森：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谈》，<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3-10-09/1706241976.shtml>。
- [7] Doug Underwood, *When MBAs Rule the Newsro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5.
- [8]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陆志宝、俞再林译，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 [9] John D. Stevens. *Sensationalism and the New York Pr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55.
- [10] Mark Harrison, *Sensationalism, Objectivity, and Reform in Turn-of-the-Century America*, in Carol A. Stabile, eds., *Turning the Century: Essay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p. 55.
- [11] Frank Luther Mott: 《美国新闻事业史》，罗篹、张逢沛译，世界书局1975年版，第406页。
- [12] 李剑鸣：《关于20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 [13]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 [14]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63页。
- [15]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15页。
- [16]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陆志宝等译，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 [17]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06~107页。
- [18]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1页。
- [19]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陆志宝等译，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 [20]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11—112页。
- [21] Stephen J. A. Ward. *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Ethic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94.
- [22] Doug Underwood, *When MBAs Rule the Newsro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5.
- [23] Paul Starr. *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 256.
- [24] Edwin Schuman. *Step into Journalism*. Evanston, IL: Correspondence School of Journalism, 1894, p. 7.
- [25] Stephen J. A. Ward. *Inventing Objectivity: New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in Christopher Meyers, eds. *Journalism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41.
- [26]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陆志宝等译，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380页。
- [27]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79页。
- [28] Bernard Roshco: 《制作新闻》，姜雪影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7页。
- [29]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Some Newspapers and Newspaperme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p. 46.
- [30]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13页。
- [31] 张健：《从“尴尬的亲戚”到“高高在上的主人”：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公关业与报刊关系的再构建》，《新闻大学》2010年第2期。
- [32]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0-91页。
- [33] Trevor D. Dryer.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Nevada Law Journal, Winter 2008, Vol. 8, Issue 2, pp. 541-569.
- [34] Mark Harrison. *Sensationalism, Objectivity, and Reform in Turn-of-the-Century America*. in Carol A. Stabile. eds., *Turning the Century: Essay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p. 58.
- [35] 朱迪丝·李钦伯格：《为客观性辩护》，载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 [36]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2页。
- [37] H. S. 康马杰：《美国精神》，杨静予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 [38] 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0页。
- [39] 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何颖怡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0-91页。
- [40] 林肯·斯蒂芬斯：《新闻与揭丑II：美国黑幕揭发报道先驱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万胜主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331页。
- [41] 林肯·斯蒂芬斯：《新闻与揭丑II：美国黑幕揭发报道先驱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万胜主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319页。
- [42] 肖华锋：《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导论》第18~26页。
- [43] Samuel P. Hays. *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 1885-191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 89.
- [44] David L. Protess等：《调查性报道的界定、发展及议程设置》，《媒介研究》2004年第4期。
- [45] 王希：《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兼论中国制度转型的方向》，载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 [46] Paul Starr. *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 256.